

我11岁那年,父亲突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。我问母亲:“爸爸去哪儿了?”母亲含泪说:“去山沟沟了。”

山沟沟,在浙皖交界深山峡谷中,四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山,山峰连绵,人烟稀少。20世纪60年代,建设“小三线”,父亲奉命去建一个军工厂。去的都是上海人,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穷乡僻壤。

父亲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天,带我们全家来到人民公园。我们兄妹四人还都是小孩,母亲抱着小妹,父亲用他心爱的德国相机,拍了一张全家福。但他并没告诉我们,这张全家福所包含的意义。多年以后我才明白,这是他在向我们告别,向大上海告别。

开始几年,父亲像与我们失散一样,杳无音信。家里每过几个月会收

到一封“杭州505信箱”的来信,母亲不让我们看,神秘兮兮的,可是每每半夜,我总会被一种莫名的声音惊醒,只见母亲点着一个小台灯,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泣涕唏嘘。我似梦似醒地望着她,不知所措。

中学那年暑假,我跟母亲吵着要去见父亲,母

山沟沟里的父亲

张耀

亲说试试问一下能不能去。一个星期后,父亲那边终于答应了。我高兴极了,还到处跟邻居和同学们炫耀,好像是去一个旅游胜地度假一样。在一个天还蒙蒙亮的早晨,我带着八岁的小妹,坐上了解放牌军用大货车,向我梦想中的山沟沟进发了。

大货车一路疾驶,中午到了杭州,过临安后不久,就进入了山区。车窗

外,茫茫山海,层层叠叠,盘山公路蜿蜒起伏,很是壮观。更令人惊讶的是漫山遍野的树枝上都挂满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。我第一次见识,问司机,他说是野生的山核桃。后来,杭州小核桃成了上海人民最喜爱的年货之一。

后来又知道,为了建设“小三线”,专门先开山辟路,修建了这条盘山公路。这深山老林,当年日本鬼子都不敢贸然进去。

车在山里开了至少三个小时,沿途一片青山绿水,云雾似轻纱般缠绕山腰,偶有飞鸟穿林,山脚下,碧水蜿蜒,波光粼粼,映着蓝天白云,我兴奋极了。傍晚时分,天空中突然乌云笼罩,雷声隆隆,狂风暴雨倾盆而下,不过片刻,前面的道路已被淹没。我惊恐万分,司机却云淡风轻地说:“没事,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原来他经历多了,这种情况是常态。

很晚的时候,夜色中,迎面而来很多解放牌军用大货车,浩浩荡荡,神龙不见尾。司机说:“快到了,这是厂里生产的产品,正由部队官兵押运出山。”

当我们的大货车进入宿舍区时,只见远远有个人一手打着伞,一手拿着手电筒照着大货车。我看不清,但见一束光透过车窗,然后听到父亲带有宁波口音的大嗓门:“到嘞,到嘞。”

父亲满头白发,胡子拉碴,皮肤黝黑,体魄强壮。我很惊讶。印象中的父亲完全变了模样。想当初人民公园的父亲,皮肤白皙,身材颀长,戴着金丝

半亩塘

朱锁成

闸北公园有个半亩塘。不到一亩,自称半亩,至诚至谦。

济南趵突泉,能做天下第五,绝不同镇江中冷泉争第一。扬州大明寺有泉,一块石头自书“天下第五泉”。至于此五是否那五?几个谦谦君子,自得其乐,大可不必较真。

半亩塘瘦伶,乃不缺绿水、碧草、金鱼摆尾舞鳞。北边有一拱形石桥,一只小舟一支长竿来来往往,打捞杂物水草。南边有一个小亭,每到周末,一群老人吹拉弹唱。半亩塘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一展水骨娇柔万顷。拐弯处往往看不到月圆。

半亩塘是一张试卷。若问:是争第一还是第二,月盈还是月缺,一亩还是半亩?答曰:身体里的西湖,18亩耕地只需半亩良田……

陆小曼是我母亲吴兰的远房表妹,比我母亲小一岁,籍贯常州,出生在上海。本文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小事。

我母亲的舅舅谢霖从日本学成归来,成为中国在国外获得注册会计师身份第一人。那时正值晚清政府为了方便对外经济结算,决定在上海成立国家“交通银行”,我舅公成为创建交通银行元老之一。我父亲入职交通银行后移居上海。我母亲与小曼表妹交往不多,只是通过亲戚间的交往了解她的一些情况,而更多的是通过报纸新闻风闻她的种种遭遇。

通过亲戚之间的口耳相传得知,陆小曼幼年有英国专职女教师为她教授英语、传授礼仪,举手投足风姿绰约、仪态万方。当年的她让年轻的徐志摩无法忘怀,尽管家族里保守传统长辈们纷纷反对两人的结合,但两位年轻人决心结合在一起,家人也无法阻挡,所以渐渐与之疏远。可惜徐志摩竟遭飞机失事而意外造成天人相隔,陆小曼命运起伏跌宕,颇不如意。家中族人都感知的是,经历如此意外、情感挫折后,陆小曼的生活态度变化很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考虑到陆

边眼镜,温文儒雅。如今站在我面前的父亲,就像山沟沟里的一个大汉。

让我更惊讶的是父亲的住房。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砖瓦结构的集体宿舍。父亲在二楼的一个单间,房间里放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,雇一个副书记一起住。他俩的下铺都装有缝满补丁的白色纱布蚊帐,上铺全是书籍。每人一张写字桌,上面放着一只台灯和几个搪瓷碗。再加两把木椅,两个木箱,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。没有衣柜,大热天连一只电风扇也没有。卫生间在楼下是公用的。一个堂堂的大厂干部,生活起居竟然像苦行僧一样。

我与小妹的到来,似乎跟他也沒什麼关系,他每天起早摸黑,早上7点就出门了,晚上6—7点回来打理一下,7点后又出发直到晚上12点。他把一沓饭菜票交给我,让我们自己去食堂吃饭。我一直没明白,他什么时候吃饭?我们连吃饭时间都见不到他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他:“你怎么不陪我们出去玩玩呢?”以前一直知道那地方离黄山不远,我是多么渴望呀!“好,礼

关于父亲的老相机与我的左轮玩具枪的怀旧文章,忘了关闭群发通知,刚发上去的时候,和往常一样,悄无声息。忙完手头的事,隔了几个小时再点开后台,心里盘算着,按惯例,应该有五六个阅读了吧。可这一看,真把我惊着了,那条往日一直躺平的

阅读量线条,竟自己站了起来,不管不顾地“噌噌噌”往上冲,不但轻松突破了“十几”的天花板,还一鼓作气跃过了100大关,这是我公众号生涯里破天荒的“三位数”里程碑。接着它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飙:1000、3000、5000……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;每一次刷新页面,数字都在创造新的历史。

我揉揉眼,反复确认,没错,

陆小曼二三事

张孙玮

小曼的才华,聘她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。她在经济生活上一个来源便是文史馆所发工资及奖金,折合如今的1.5万元左右。文史馆先后聘有1272位(截至2024年12月)馆员,陆小曼作为其中一员,也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作用。虽无什么文史巨著,但她的口才出众、表述清晰而风趣,给人印象深刻。

在陆小曼个人生活上,她有个小名阿锦的吴姓表妹,个性活泼可爱,同样喜欢京戏,喜京腔京韵,加上音色甜美,因此与陆小曼颇有共同爱好,使长期居住在一起,表妹照顾其起居生活。阿锦表妹有一对双胞胎儿子,被陆小曼视为自己儿子一般。其中的弟弟与我要好如兄弟。我出生在上海,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常州上中学,也住在吴氏中丞第。当年的中丞第是个坐北朝南的五进豪宅,其大门坐落于东西通衢的麻巷,宅后是一个假山层叠、花木布局自然流畅的私家花园,景观奇妙,大树



拜天陪你们去。”父亲望着我爽快回答,我很开心。

礼拜天终于到了。那天父亲破例没去厂里,带着我们去四处转转,照例是双脚行走。我知道他有一辆吉普车,但在厂里他是不用的,更不用说是带我们出去玩了,我心里估摸着这一趟玩能走多远。

我们沿着通往厂区的道路一路前行,两边群山环抱,山风轻拂而凉快,空气是那样清新,满眼参天树木,阳光掩映。不经意间便来到了厂区,父亲说进厂区要出人证,只是带你们看看。我们当然不可以进去,其实我也没想要进去。父亲突然说他有事要去厂里,让我们自己回

去。天知道他又要去干嘛!我呆若木鸡,开心戛然而止。望着父亲急转而去的背影,我攥着衣角站在原地,连喊他的勇气都没有,怅然若失。

好端端的一个暑假旅行计划,从开始便可知日后的结局了。无奈,无聊,我开始翻看父亲床上的书,那可全是一些政治书籍呀,好吧,看吧,否则无法打发大好时光。小妹则每天把父亲借来的几本儿童连环画反反复复地翻看,爱不释手。

父亲在山沟沟里一待就是20年。后来才知道,他在厂里为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新型火箭弹呕心沥血,从产品的技术研发到

生产管理,以及这么多人的后勤保障协调工作,他都要亲力亲为。产品最后试验成功,并在1979年立下奇功,父亲也因此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。

父亲的一生,在年富力强的时候,赤胆忠心,不顾“小家”,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“大家”。国庆期间,我加倍怀念去年故世的父亲。他们这代人的奉献,是对责任的传承;我们后辈,不能忘记新中国每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。



香烟壳子

陈建兴

玩具是孩童时期最亲密的游戏伙伴。我的童年,除了自制过不少玩具外,有一阵子,喜欢收藏香烟壳子,迷恋的程度不亚于现在有的孩子喜欢奥特曼、乐高和“拉布布”。

夏天的弄堂,一桌桌打牌的人聚在路灯下打大怪路子,烟蒂扔得遍地,我守株待兔般地等着别人扔掉的香烟壳子。时常有人让我代买香烟、火柴,我更是乐意跑腿。买回烟后,我小心翼翼地拆开,帮他们一支支装在铁皮烟盒里,得到一只崭新无皱捏的香烟壳子,心里美滋滋的。那些日子,弄堂里只要有牌摊头,就会有我的影子。

知道凯旋路上的上海西站候车室旅客多,说不定也能捡到外地的香烟壳子。放学后,我抱着侥幸的心情直冲西站,果然,捡到了杭州的“利群”、宁波的“新安江”等,欣喜不已。从此,一有空便去西站候车室,重复的香烟壳子与邻家孩子交换到了上海的“牡丹”“光荣”。

当然,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“秘密”。去西站回家的路上,我忘不了中山公园门口的20路、21路和96路公交终点站兜一圈,碰碰运气。售票员清理车厢,扫下来的也能捡到几只香烟壳子和一些漂亮的糖纸头。一些女孩子得知我有不少糖纸头后,纷纷拿着父兄抽完的香烟壳子来交换,让我有了挑精拣肥的机会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弄堂里的年轻人结婚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婚宴的。我知道,吃喜酒的台子上都会有红“牡丹”和“红双喜”,这是那个年代拿得出手的高档香烟。圆台面上香烟一圈发下来,很快就有空壳子拿了,我便去候着。一俟有人发完香烟,我一个箭步冲上去,“爷叔”“娘舅”叫得“乒乓响”,香烟壳子就到手了。这种香烟壳子都是全新的,品相好。运气好的时候,新郎新娘发喜糖,我还能得到八粒一包的喜糖。

弄堂烟纸店的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,“飞马牌”七分五根,“大前门”一角五根。店主悄悄对我说:“人家叫依买香烟,依就到我的店里来,我会给你空壳子的。”从此,我跑他的小店更勤了。店主也没有食言,时常塞给我一二只新的香烟壳子。弄堂爷叔们是抽不起高档香烟的,所以,我的收藏基本都是“大前门”“飞马”“劳动”“勇士”和外地的香烟壳子。为了得到一个没有的香烟壳子,用十只、二十只“大前门”换一只,或者用几只品相差的换一只品相好点的,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

同学有一只“中华牌”香烟壳子,让我羡慕得不得了。那时“中华”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卖。我天天盯着他,提议从我的收藏簿子里挑二十只各式香烟壳子交换,被他一再拒绝。恰巧,学校动员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,还给每个学生定了指标。看到同学一筹莫展的样子,我与他商量,帮其完成指标,“中华”让我。同学回家告诉了他母亲,他母亲一口同意,说香烟壳子又不能当饭吃,还催他与我“成交”。

我花了三天放学后的时间,跑到长风公园附近捡了大量废钢铁,帮他完成了任务,我也得到了心爱的“中华”。那时还不知道这种东西叫烟标。这是捡来的乐趣,是低碳的收藏。可惜的是,由于种种原因,许多都没有保留下来。但快乐却保留在记忆里,不可磨灭。

忙工作之余,带我们姐弟仨登长城、下馆子;父亲在那台珍贵的相机被借出摔坏并好不容易修好后,依然不改慷慨……可能正是这些质朴的家庭往事,引发了许多人共同的情感记忆,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文章发表已过去很多天了,阅读量的数字还在慢慢往上蹦,但我已经不那么频繁地去关注它了。以后,我的公众号阅读量大抵还会恢复到个位数的常态。不过没关系,就像那台包浆的老相机和那把生锈的左轮枪一样,有些东西的价值,本来就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。

流量固然非我所长,然而此番意外“出圈”,却仍令我心生感念。正是网友们一次次的转发、推荐与点赞,才让我那些纯粹私人的记忆,得以与成百上千个陌生的心灵产生共鸣。

苗莱湖之晨

方忠麟

摄

时尚